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Poli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文学的政治 Jacques Rancière

[法] 雅克·朗西埃 著 张新木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文学的政治

[法] 雅克·朗西埃 著 张新木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的政治/(法)朗西埃著;张新木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8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14047-1

I. ①文… II. ①朗… ②张… III. ①政治理论-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3783 号

Poli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by Jacques Rancière

Copyright © Editions Galilée 2006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8-33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张一兵主编

书 名 文学的政治

著 者 [法]雅克·朗西埃·

译 者 张新木

责任编辑 陈蕴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1/16 印张 19.25 字数 177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4047-1

定 价 49.8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Poli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Jacques Rancière

目 录

假 设	001
文学的政治	003
文学误解	043
形 象	065
艾玛·包法利的处死——文学、民主和医学	067
在战场上——托尔斯泰、文学、历史	101
闯入者——马拉美的政治	113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的快乐的科学	141
博尔赫斯与法国病	185
交 叉	213
通过窗户的真理——文学的真理、弗洛伊德的真理	215
史学家、文学与传记体裁	241
哲学家笔下的诗人——马拉美和巴迪欧	263
文献来源	295

假 设

文学的政治

文学的政治并非作家们的政治。它不涉及作家对其时代的政治或社会斗争的个人介入。它也不涉及作家在自己的书本中表现社会结构、政治运动或各种身份的方式。“文学的政治”这个说法势必导致文学以文学的身份去从事政治。它假设人们不必去考虑作家们是应该搞政治，还是更应该致力于艺术的纯洁性，而是说这种纯洁性本身就与政治脱不了干系。它假设在作为集体实践的特殊形式的政治和作为写作艺术的确切实践的文学之间，存在一种固有的联系。

这般提出问题，就有必要阐明一下相关术语。我首先就有关政治的术语做出简要的解释。人们常常将政治与行使权力和夺权斗争混为一谈。然而，不是仅仅有了权力就有了政治。也不是仅仅有了调节集体生活的法律就有了政治。必须配置一种共同体（communauté）的特殊形式。政

治就是组建一种特殊的经验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某些客体被当作共同的成分，而某些主体则被视为有能力指定这些客体，并且对其加以评价。然而这种组建并不是建立在人类学不变量上的一个固定已知数。政治所依托的已知物总是颇有争议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著名的说法，说人类是一些政治生灵，因为他们拥有能够将正义与非正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言语，而动物仅仅拥有表达快乐或痛苦的叫声。然而整个问题在于必须知道，谁有资格去评判什么是协商性言语（parole délibérative），什么是不愉快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政治活动就是一种对抗，以便决定什么是言语或叫声，重新描绘出政治能力借以自我证明的那些感性边界。柏拉图的《理想国》首先指出，手艺人没有时间去作他们活计以外的其他事情：他们的事务，他们的时间表，而他们适应事务的能力又不让他们参与这个政治活动构成的额外事务。然而政治恰恰就在这时候开始，就在这种不可能性受到质疑之时，那些除了做自己的活计而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开始花费这个他们并不拥有的时间去证明他们也是一些说话的生灵，能够参与一个共同的世界，而不是一些只会发怒或受苦的动物。这种对空间和时间的分配与再分配，对地位和身份、言语和噪声、可见物和不可见物的再分配，形成了我所说的感性的分割（partage du sensible）。政治活动对感性的分割进行了重新配置。它向公共事务的舞台引荐了

新的客体和主体；它让不可见变得可见，让那些曾经仅仅被当作吼叫的动物成为可听的说话生灵。

因此“文学的政治”这种表述势必包含如下含义，即作为文学的文学介入这种空间与时间、可见与不可见、言语与噪声的分割。它将介入实践活动、可见性形式和说话方式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分割出一个或若干个共同的世界。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知道“作为文学的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学”并不是一个跨历史术语，指称言语和写作艺术的所有生产的整体。该术语只是在很迟以后才具有如今这个普及的意义。在欧洲各国，“文学”这个词直到19世纪才脱离了其古老的文人学识的意义，以指称写作艺术本身。斯塔尔夫人的作品《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于1800年出版，该文献常常被看作这种新用法的宣言。然而许多评论家似乎只把它看作换了个名称而已：他们努力在历史上确定的事件与政治潮流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建立一种超越时间的文学概念。另一些评论家则试图考察文学概念的历史性（*historicité*）。然而他们一般是在现代主义范式（*paradigme moderniste*）的范畴内考察这个问题。

① 斯塔尔夫夫人（Madame de Staël, 1766—1817），原名安娜-路易丝·热尔曼娜·内克（Anne Louise Germaine Necker），法国女小说家、随笔作者。《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De la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译注（本书未注明“译注”的注释皆为原注。）

现代主义范式将艺术的现代性确定为每种艺术与其表现的奴役地位的决裂，使决裂成为某一外部指称对象的表达手段，以及该指称对象在其物质性上的集中。因此人们将文学现代性展现为一种对语言的不及物用法的应用，与语言的交际用途相反的应用。这对确定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而言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标准，很快会导致一种两难命题：要么将文学语言的自主性与某种被看作文学工具化的政治用法对立起来，要么武断地在文学的不及物性，即设想为对能指的唯物至上的肯定，与革命实践的唯物主义理性之间肯定一种连带关系。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建议了一种非常友好的共识，将诗歌的不及物性与文学的及物性对立起来。他说，诗人们使用词语就像是使用物品。兰波在写“哪般灵魂无缺陷”时，显然并不提出任何问题，而是将这句话变成一种晦涩的物质（substance），与丁托列托笔下的黄色天空相当。^① 因此谈论诗歌的某种介入是毫无意义的。反过来说，作家们必须与意指过程（significations）打交道。他们把词语当作交际工具来使用，而且不管是否情愿，他们借此介入建构一个共同世界的任务。

不幸的是这种友好的共识并不解决任何问题。一旦将文学散文的介入根植于语言运用的本身中，萨特就得解释为什么福楼拜这类作家要改变散文语言的透明，将文学交

^① 让-保尔·萨特，《什么是文学？》（*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载《境地Ⅱ》（*Situations II*），伽利玛出版社，1948年，第69页。

际的手段转变为一种自身目的 (fin en soi)。他必须在年轻福楼拜的个人神经官能症与当时阶级斗争的黑暗现实的结合中找到这种改变的理由。因此他必须在外部寻找一种文学的政治性 (politicité), 即他认为在其语言的特殊使用中已经建立的政治性。这种恶性循环并不是一种个人的错误。它与企图在语言上建立文学特殊性的意愿相关。而这种意愿本身又与艺术的现代主义范式的各种简化方式相关联。现代主义范式试图在艺术的固有物质性上建立艺术的自主性。因此它迫使人们要求一种文学语言的物质特殊性。然而这种特殊性似乎很难找到。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诗学功能事实上在不停地相互交织, 在充满修辞手段的日常交际中是这样, 在善于为其利益而改变完全透明的陈述句的诗歌实践中也是这样。兰波的诗句“哪般灵魂无缺陷”肯定不会唤起回应这个条件的任何心灵折扣。人们也只能像萨特那样做出这般结论, 说疑问“不再是一种意指, 而是一种物质”^①。因为这个虚假的问题与语言的日常行为分享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它不仅听从于句法规则, 而且还听从于疑问分句和感叹分句的日常修辞用法, 这在形成兰波特点的宗教修辞中尤为活跃: “我们中间谁无罪?” “让你们中间无罪的那个人去指责他人吧!” 如果说诗歌偏离了普通的交际, 那么它并未借助一种可能废除意指的不及物用法。这

^① 让-保尔·萨特, 《什么是文学?》, 载《境地Ⅱ》, 伽利玛出版社, 同前, 第69页。

是在两种意义制度之间执行一种连接：一方面，“哪般灵魂无缺陷？”是一个“普通的”句子，在它的位置上，就在影响心灵反省形式的诗句中；但是它也处在诗句给“季节啊，城堡啊！”的回应中。这是一个谜团式句子：一个“无意义的叠句”，就像儿歌和民谣的叠句那样；这也是“观看其思想绽放”的那个人的“琴弓拨动”，那个人在所使用的语言句子中，在儿歌那空无意义的摇晃中，见证了这位陌生客的突然出现，他应召为集体生活制造一个新的意义，创造一个新的节奏。

因此，兰波诗句的独特性并不属于语言的某种反交际的特有用途。它从属于一种恰当与不恰当、散文与诗歌之间的新型关系。文学的历史特殊性不取决于语言的某种状态或其特殊用法。它取决于语言权力的一种新的平衡，一种新的方式，该语言以让人看到和听到的方式行事。简言之，文学是一个识别写作艺术的新制度。一种艺术的识别制度是一个关系体系，是实践、实践的可见性形式和可理解性方式之间的关系体系。因此，这是对感性的分割进行干预的某种方式，而这种分割确定着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世界对我们来说可见的方法，这种可见让人评说的方法，还有由此表现出的各种能力和无能。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才可能思考“就如这般”的文学的政治，思考它对各种分割的干预方式，即对组成共同世界的物体的切割，对居住在这个世界中的主体的分割，还有对他们观察、命名

和改造这个世界的能力的分割。

怎样标示这个文学及其政治所固有的识别制度的特征呢？要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对比一下同一位作家的两种政治性阅读，该作家被视为文学自主性的典范代表，他使文学摆脱了任何外在的意指形式，摆脱了任何的政治和社会用途。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将福楼拜描写成贵族式攻击的旗手，对抗散文语言的民主本质。在他看来，这种攻击具有某种语言石化（pétrification）的形式：

福楼拜写作是为了摆脱人类和事物。他的句子围绕物品，抓住物品，定住物品，折断物品的腰，自我封闭到物品中，将自己变成石头，让物品与句子一起石化。^①

萨特在这种石化现象中看到了纯文学旗手们对资产阶级战略所做的贡献。福楼拜、马拉美和他们的同行都声称要拒绝资产阶级的思维模式，梦想一种新型的贵族阶级，这个贵族阶级将生活在一个词语得到净化的世界中，一个被设想为遍布珍贵宝石和奇花异草的秘密花园。然而这个秘密花园不过是散文式私家花园的理想投影。为了建设这个花园，这些作家必须让词语摆脱其交际用途，使词语摆

^① 让-保尔·萨特，《什么是文学？》，载《境地Ⅱ》，伽利玛出版社，同前，第172页。

脱将其当作政治辩论和社会斗争工具的人们之手。因此，词语和物品的文学石化以自己的方式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战略，这个阶级已经在1848年6月的巴黎街垒战中看到了自身业已宣告的灭亡，并通过阻止自身所激发的历史动力，试图逃避其灭亡的命运。

如果说这种分析值得我们关注，那是因为它重新采用了福楼拜的同代人所使用的解读图式。他们指出在福楼拜的散文中，有一种对细节的痴迷，还有对行动和人物的人类意指的冷漠，这使得他以同样的重视程度对待人类生灵和物质事物。巴尔贝·多勒维利^①对他们的评论进行了总结，说福楼拜将他的句子推向前方，就像挖土工用独轮车往前推送石头一样。因此，所有这些批评家都异口同声地指出福楼拜散文的特点，把它看作人类言语和行为的石化事业，最终就像萨特后来所做的那样，可以从这种石化中看到一种政治性症候。然而他们也一致用与萨特相反的方式来理解这种症候。对他们来说，语言的“石化”远不是反民主的攻击武器，而是民主的制造商标。语言的“石化”与民主主义并驾齐驱，鼓励着小说家的整个事业。福楼拜让所有的词语一律平等，并以同样的方法消除高贵主体与卑微主体之间、叙述与描写之间、前景和背景之间，最终

^① 多勒维利 (Jules Barbey d'Aurevilly, 1808—1889)，法国作家。作品有《恶魔》(Les diaboliques)、《老年情妇》(Une vieille maîtresse)、《无名故事》(Une histoire sans nom) 等。——译注

还有人类和事物之间的任何等级。毫无疑问，他排除了任何的政治介入，以同样的蔑视态度对待民主派与保守派。对他而言，作家应该自律，不要试图证明任何东西。然而这种针对任何信息的冷漠，在那些批评家看来就是民主的真正标记。民主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一种普及的冷漠的制度，就是成为民主分子、反民主分子或不关心民主的人的平等机会。不管福楼拜对待民众和共和国的情感如何，他的散文至少是民主的。甚至是民主的化身。

诚然，萨特并不是第一个将反动论据转变为进步论据的人。20世纪的批评家借以阐明19世纪文学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阐释，主要沿袭了针对君主制和代议制秩序中怀旧物的分析和论据，以对抗“布尔乔亚式”小说。我们完全可以权作消遣。但最好是设法理解其中的原因。为此，就应当重新建立一种逻辑，为某种写作实践指定一种政治意义，而该意义本身又可以用两种相反的意思来解读。因此必须抓住三个事物之间的关系：一种倾向于消除意义的写作方式，一种从这种意义的隐退中看到某种症候的阅读方式，最后是以相对的方法解译这种症候的政治意义的可能性。写作的冷漠，症候性阅读的实践，还有这种实践的双重性，它们都属于同一个措施（dispositif）。而这个措施完全可以作为文学本身，即作为识别写作艺术的历史制度的文学，作为词语的意指制度和事物的可见性制度之间特殊纽结的文学。

以“文学”这个术语指意的历史创新就在这里：它不在某个特定的语言中，而是在一种全新的方式中，在连接可说与可见、词语与事物的方式中。这才是古典文学旗手们的批评中反对福楼拜的关键所在，同时他们也反对被称为文学的这种写作艺术的新型实践的工匠们。他们说，这些革新者已经丢失了人类行为和意指的意义。他们以此想说，这些革新者已经丢失了某种行动的意义，以及某种连接行动和意指方式的意义。为了理解这个丢失的意义是什么，有必要回忆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古老原则，即支撑古典表现秩序的原则。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诗歌并非由语言的特殊使用来确定。它是由虚构来确定的，而虚构又是对行动着的人们的模仿。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事实上定义着某种诗歌的政治。它确实将行动的因果合理性对立于是生活的经验性。连接行动的诗歌相对于讲述连续事件的故事的优越性，参与行动世界的人们相对于被封闭在生活世界的人们的优越性，即相对于封闭于纯粹复制存在的世界中的人们的优越性，这两种优越性完全对应。根据这个等级关系，虚构被划分为不同的体裁。有高贵的体裁，用于刻画高贵的行为和人物，也有低下的体裁，用于描写小人物的故事。体裁的等级也让风格服从于一种相应的原则：国王必须以国王的身份说话，普通民众以普通民众的身份说话。这一套标准将比学院式约束的定义更为严格。它将诗学虚构的合理性与人类